

2025年第20期新闻稿：血腥的话语笼罩了我们的世界



《无题》，达莉亚·阿卜杜拉·巴希尔（苏丹），作品无具体年份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过去数周，国际社会的焦点无疑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升级的紧张局势，待尘埃落定后，我们将对此撰写更详细的分析。尽管双方军队均未越过边境或实际控制线，但鉴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外界的担忧不无道理。如今，局势已切实退回至1948年的停火状态，此后几十年间，双方始终未能签署正式的全面和平条约，停火状态便一直延续至今。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理所当然地持续关注着巴勒斯坦发生的种族灭绝。以色列正不断收紧对加沙的全面封锁，此举或许是对巴勒斯坦人于2025年1月27日不惧种族灭绝战争、毅然返回加沙北部的报复。

然而，一些冲突却几乎被彻底遗忘，比如苏丹持续至今的战火。本期新闻稿便聚焦于此，本文内容基于与人道主义工作者和苏丹政治人物的对话。有一种论调认为，这场战争令人费解，解释不清；这种说法本身便反映出我们报道中的种族主义，即认为非洲的冲突总是无法理喻且无休无止。当然，战争必有其根源，这也意味着必有其终结之道。我们必须摒弃那套笼罩世界的血腥话语，转而去探寻那些蕴含着和平可能性的政治细节。



《无题》，拉希德·迪亚卜（苏丹）作于2016年

苏丹的和平本就脆弱，但两年前，同属苏丹的苏丹武装部队（SAF）与快速支援部队（RSF）之间兵戎相见，那仅存的和平希望也随之破灭。2025年4月11日，在这场战争爆发两周年之际，快速支援部队对北达尔富尔的扎姆扎姆（Zamzam）难民营发动了一场骇人听闻的袭击。带着三个孩子的幸存者哈娃回忆道：“炸弹落在医院……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只来得及背着孩子逃离。”

截至4月16日，这座曾收容五十万难民的营地被夷为平地，数百人丧生，其余幸存者被迫逃往附近的法希尔（El Fasher）和塔维拉（Tawila）。在两年战火中，至少已有15万人丧生，近1300万人流离失所，占苏丹5100万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对大多数苏丹人民而言，这场持续的灾难似乎毫无意义。

然而，在扎姆扎姆大屠杀六年前的2019年4月11日，一切似乎截然不同。当时，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最终引爆了军事政变，推翻了长期执政的总统奥马尔·巴希尔。反对巴希尔政府的抗议活动始于2018年12月，起因是通货膨胀和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巴希尔无力回应人民的诉求，即便动用武力也难以以为继，苏丹军方倒戈给了他最后致命一击（正如2011年埃及军方抛弃其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一样）。巴希尔最终被后来的过渡军事委员会（Transitional Military Council）推翻，该委员会由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将军领导，穆罕默德·“赫梅迪”·哈姆丹·达加洛中将从旁协助。



《和平革命》，贾拉勒·优素福（苏丹）作于2021年

领导街头抗议的团体组成了一个名为“自由与变革力量”（Forces for Freedom and Change, FFC）联盟。该联盟成员包括苏丹共产党、全国共识力量、苏丹专业人士协会、苏丹革命阵线、苏丹公民和政治团体妇女组织以及众多苏丹抵抗委员会或邻里委员会。在“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领导的抗议压力下，军方于2019年中签署协议，同意监督向文官政府的过渡。

在非洲联盟的协助下，由五名军方成员和六名文职成员组成的过渡主权委员会（Transitional Sovereignty Council）得以成立。委员会任命阿卜杜拉·哈姆多克（1956年生）为新总理，内玛特·阿卜杜拉·海尔（1957年生）为首席大法官。哈姆多克是一位沉稳的外交官，曾在非洲经济委员会做出过非常重要的工作，似乎非常适合担任过渡时期总理的角色。海尔则是一位毕生投身司法且曾参与反巴希尔抗议运动的法官，作为司法机构负责人展现了恰如其分的风范。一扇通往新未来的大门似乎已为苏丹敞开。



《百万人游行》，阿布·奥贝达·穆罕默德（苏丹）作于2021年

但是，不久之后，苏丹便沦为其自身历史压力的牺牲品。2021年，在数次未遂政变后，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将军夺取了政权，表面上是为了捍卫过渡进程，实际上是为了让巴希尔旧部摆脱孤立，重返政府。旧政权复辟往往会打破革命进程，因为旧政权对军队和社会的控制绝非轻易就能摆脱。布尔汉和赫梅迪这两位军方人物心知肚明，一旦追究巴希尔政府的罪行，他们难逃重创，因为当年他们正是这一政权的打手。（赫梅迪的部队，俗称“金戈威德”Janja'wid，即“骑马的魔鬼”，在巴希尔主导的达尔富尔军事行动中，因侵犯人权而饱受指控）。同样重要的是，这两人及其亲信集团有巨大的物质利益牵涉其中，包括对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金矿的控制。

对于这类人而言，对绞刑架的恐惧和对更大利益的渴求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的权力移交需要与旧社会彻底决裂，除非军队崩溃或按照新社会的形象而非旧社会的元素进行彻底重组，否则很难实现。布尔汉和赫梅迪都抵制这一过渡期，并通过对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会和共产党人）的迅速镇压，在喀土穆巩固了权力。



《交缠》，里姆·阿尔吉利（苏丹）作于2022年

当一群恶棍为某个国家组建团体时，该国的所有人都应警惕。2021年，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和美国组建了“苏丹四方小组”（QUAD for Sudan），宣称其目的是帮助该国恢复民主。苏丹处于地缘政治阴谋的刀刃之上，关于苏丹反革命军已开始与俄罗斯发展密切关系的指责开始甚嚣尘上。2019年，巴希尔曾讨论一项允许俄罗斯在红海建立海军基地的协议，将使俄罗斯在非洲大陆获得立足点。巴希尔的倒台危及了该基地的存续，但在其旧部重新掌权后，相关议题再度开启。这使苏丹陷入了西方与俄罗斯之间，以及海湾阿拉伯君主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的十字准心。

当一个国家卷入他国纠纷时，其自身的问题便难以辨明。在武装部队整合和利益分配问题上，军方与巴希尔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表面上，他们争论的焦点似乎是回归文官政府的时间表，但实际上，其核心却是对军权和资源的争夺。



《通往鱼市之路》，萨拉赫·埃尔穆尔（苏丹）作于2024年

这些内部的权力倾轧愈演愈烈，最终在2023年点燃了内战的战火。这注定是一场代理人战争，其特征一览无遗：苏丹武装部队背后有埃及和沙特，快速支援部队则由阿联酋撑腰，更有多方外部势力在幕后操盘。尽管和谈仍在各地进行，却始终停滞不前。战事仿佛陷入了自身的逻辑——苏丹武装部队的30万兵力，面对10万士气高昂的快速支援部队，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进展。靠着变卖黄金和外部“输血”得来的无尽资源，足以让这场战争旷日持久地打下去，直到被世界彻底遗忘——正如刚果和缅甸边境那些无人问津的冲突一样。

联合国不断发表声明，各种人权组织则恳求对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施加进一步压力。但都无济于事。就连和平谈判也是四分五裂：阿联酋和埃及在开罗斡旋，沙特在吉达主持，而英国则决定在伦敦另起炉灶。谁在和谁谈，谈些什么，无人知晓。



《发与爱》，阿姆娜·哈桑（苏丹）作于2019年

在斡旋和平方面，非洲联盟（AU）做出了迄今最积极的努力，于2024年1月牵头**成立了**苏丹问题高级别小组（HLP-Sudan）。该小组的主席是加纳资深外交官穆罕默德·伊本·昌巴斯博士。他经验丰富，曾在2012至2014年间出任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问题联合特别代表，并执掌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

行动（UNAMID）。此人不仅熟识冲突双方的将军，也深谙苏丹局势的盘根错节。小组的另外两名成员也都是重量级人物：一位是乌干达前副总统斯佩希奥莎·万迪拉-卡齐布韦博士，另一位则是莫桑比克大使弗朗西斯科·马德拉，他曾担任非盟驻索马里特别代表并领导驻该国的特派团。目前，该小组正与东非区域组织“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通力合作，旨在推动冲突双方重返谈判桌，先达成停火，再最终敲定一份和平协议。

重要的是，苏丹问题高级别小组会见了来自该国各政治派别的广泛人士，包括政党成员、军方和公民社会团体。他们中许多人是2020年《朱巴和平协议》的签署方，该协议也曾将达尔富尔、南科尔多凡和青尼罗河地区的交战派系包括在内。但谈判人员在文职派别中面临一个难题。2023年10月，被罢免的总理阿卜杜拉·哈姆多克组建了“塔卡敦”（Taqaddum，意为“进步”）联盟，将文职方面的声音带到了谈判桌上。然而，在过去两年，联盟因“站队”问题引发内部分裂，并于2025年2月解散。此后，哈姆多克组建了一个名为“苏穆德”（Sumoud，意为“坚韧”）的新团体，力求在冲突双方间保持中立。3月，过渡主权委员会前成员哈迪·伊德里斯另立“塔西斯”（Ta’sis，意为“创建苏丹”）联盟，并推举快速支援部队的赫梅迪作其领袖。因此，就连文官团体内部也沿着内战的战线彻底撕裂。



《清真寺》，易卜拉欣·萨拉希（苏丹）1964年

去年我与哈姆多克交谈时，能感受到他在漫长的战争和徒劳的谈判中已心力交瘁。但这位一向沉稳的外交官秉持着一个信念：战争终将耗尽军队的血与火，从而迫使他们重返谈判桌。他深谙本国历史：1956年，苏丹赢得独立，但国家旋即陷入首次南北内战，战火直到1972年《亚的斯亚贝巴协议》签署后才暂告平息。此后，在南方石油收入的支撑下，国家有过十年和平，但这已是遥远的记忆。1983年，第二次南北内战爆发，一直持续到2005年，并最终催生了2011年的公投，导致国家一分

为二，分裂成苏丹和南苏丹。而在达尔富尔，一场惨烈的冲突自2003年燃起，直到2010年才渐趋平息，这场冲突的余波最终促成了2019年巴希尔的倒台。当时，人们高呼的口号是“tisqut bas”——“倒台就行！”。他倒了，但脚下的大地，至今仍在震颤。

和平对苏丹人民而言，已是几代人的奢望。哈姆多克的希望，既是与历史对抗的希望，也是为了未来的希望。

热忱的，

Vijay